

&gt; 本期聚焦

# 弘扬新中国的奋斗精神

——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荐一批新书

本报记者 郑千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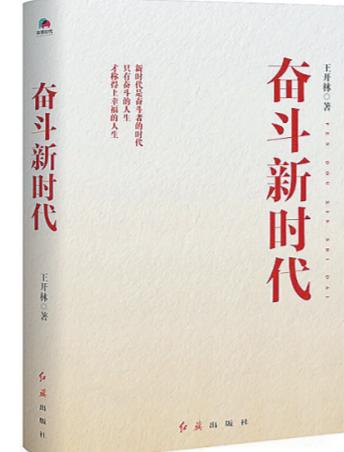
**编者按:**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,各大出版社推出一批弘扬奋斗精神的精品图书,以生动细腻的笔触,独到的见解,介绍了新时代奋斗者的光辉足迹,激荡着时代的强音。现选介如下,以飨读者。

《初心》



《初心》(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)是著名作家丁捷一部政论散文集。初心,这是当今社会的大主题,是人生的大文章。党的十九大把“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主题;一个人,一个政党,一个国家都有初心,践行初心便能凯歌行进,偏离初心难免误入歧途,该书以生动细腻的文学笔触,梳理个人、政党和国家的初心,讲述初心的建立、践行、摇摆、丧失和回归。

《奋斗新时代》



《奋斗新时代》(红旗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)是著名作家王开林新著,该书分为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”“我们都在努力奔跑,我们都是追梦人”“自胜者强,自强者胜”“成功属于勇毅而笃行的人”四大章节,共含60余篇文章。作品谈人生,谈世事,谈见闻,谈梦想,谈读书,谈勇气,虽然每篇文章看上去各自独立,但内涵或说特质其实是一致的,那就是表达了人生须乐观进取的观念。作品持一种洞明达观的态度,一直或明或暗地告诉读者,只有奋斗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,才是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人生。

《伟大的马克思》

《伟大的马克思: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》(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),陈先达著。全书以马克思



主义理论体系为参照系,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,在历史和现实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,阐释了马克思是一位超凡的伟人、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的真理,以及新时代如何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等具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,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,研究不断变化发展的世情、国情、党情,回应时代和实践中的问题,提升理论思维能力,不断推进实践创新,理论创新,更有定力、更有自信、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,做一个新时代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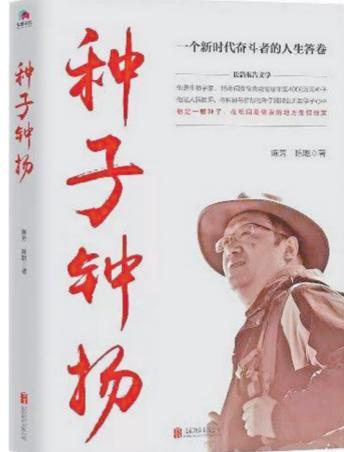
《中国天眼:南仁东传》

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,翔实生动,细节充沛地将南仁东的功业与贡献,放在整个人类天文历史上考察,视野开阔、纵横捭阖、大开大合,呈现了报国、敬业的南仁东的感人事迹,是一部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长篇报告文学。书中收入了10余幅珍贵照片,图文并茂。

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面面观》

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面面观》

(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),顾保国著。该书紧紧围绕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展开论述,深刻剖析了党员干部群众身边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、以及其存在的危害、产生的原因,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处理对策。该书语言通俗易懂、案例典型、剖析深刻、附有漫画图片,把政治性与时代性统一起来、严肃性与生动性结合起来,该书既可以作为开



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的重点读物,也可以作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警示教育的指导用书,是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的参考用书。

《忠诚 干净 担当: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回忆录》

《忠诚 干净 担当: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回忆录》(红旗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),李子敏著。作者是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共产党员,长期在兵工企业、国防工办等担任领导工作。2006年获得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。书中,在作者的娓娓道来中,我们读到了作者入党的初心和不負使命的忠诚:作者两次入党,矢

志不渝;一生忠诚报党,干净做人做事,每每临危受命,不畏艰险,以党的事业为己之大任,努力工作。细腻的描写中包含着作者对党、人生、生活的浓浓的热爱,生动的情节中宣扬了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、干净、担当。

《种子钟扬》

《种子钟扬》(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9月出版),新华社高级记者、全国“三八红旗手”陈芳与新华社战地记者陈晓所著。该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讲述了新时代知识分子,时代楷模钟扬的奋斗人生。作者以优美感人的文笔、生动翔实的细节记述了钟扬的动人事例,解密“时代楷模”钟扬的“种子”基因,追寻他16年如一日援藏的艰辛岁月、探索他心有大我、至诚报国的精神内涵,带领读者走进一位新时代奋斗者短暂而又闪亮的人生。

&gt; 民族文化探秘

## 再说昆明与“昆明族”

宋炳龙

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载:“……西自同(桐)师以东,北至叶榆,名曰榔、昆明,皆偏发,随畜迁徙,毋常处,毋君长,地方数千里。”这里是说:西边从今天的保山(桐师)以东到北边洱海边上的喜洲(叶榆)。“榔”是嵩唐县的简称,嵩唐县就是今天的云龙县的旧州;“昆明”就是“昆明国”,这个“昆明”就是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:“有越榔、昆明国……”的昆明。证据是《史记·集解》徐广说:“永昌有嵩唐县。”说明了嵩唐县是在永昌郡。索引崔浩云:“二国名”;嵩与昆明是两个国家的名字。

《史记·正义》“嵩音髓。今嵩州也。昆明,嵩州县,盖南接昆明之地,因名也。”《正义》说:“榔”与“昆明”都是地名。嵩州县与南方的昆明接壤,是地名。以上说的:按文理“榔”是指嵩唐县,今云龙县旧州;“昆明”是指滇池边的昆明,所说的是今天云龙县的旧州到昆明。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编着头发,随牲畜迁徙,不常在一起居住,没有君长,在数千里的土地上任意迁徙放牧。要不然从保山(桐师)以东到大理的喜洲(叶榆)不过二百来公里,哪有数千里地。而且大理喜洲(叶榆)

是在云龙县旧州(嵩唐县)的东北方,不是在正东方。在司马迁时期,昆明的出现只有昆明国,没有其它的地名叫做“昆明”。

另外在西汉时期还有更大的郡——越嵩郡,即今天的凉山彝族自治州,它在叶榆的东北方,这里的“北至叶榆”,如果我们加一个“东”字,成为“北至叶榆东”更为合乎逻辑。那么这里的“榔”应该指的四川西昌(越嵩郡)到“昆明”,才合乎“南接昆明之地”。太史公在写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时对这一带的地理不够熟悉,也没有像今天一样准确的地图,产生误导是难免的。

为什么有人把昆明这个地名定为“昆明族”呢?有的人把“名为榔,昆明。”误认为是从西边的保山[同(桐)师]的东方,到北方叶榆之间的民族,便产生了“昆明族”。汉武帝听了张骞从西域回来的报告,信以为真,便命令张骞从蜀国、犍为出发;并且四路一起出发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:“……南方闭榔、昆明。昆明之属无君长,善寇盗,辄(音浙)杀略汉使,终莫得通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:南方被阻挡在越嵩郡(今天四川西昌)与昆明

(今天的昆明市)。昆明地方的人没有部落首领,善于做草寇和强盗,动不动就抢劫和杀汉朝的使臣,所以没有通过。所以有史学家把这里的“榔”与“昆明”误定成“昆明族”。

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:“……出此初郡抵大夏,皆复闭昆明……于是……遣两将军、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,斩首虏数万人而去。其后遣使,昆明复为寇,竟莫能得通。”《汉书·武帝纪》元狩三年(公元前120年)颜师古注:“……汉使求身毒国,而昆明所闭。”汉朝的使臣为了寻求印度(身毒国)的道路,到了昆明被阻挡住了,《华阳国志》说:哀牢王国之所以“生民以来,未通中国”,就是因为“南中昆明阻之”。哀牢王历史以来未能与中原皇帝相通,主要是昆明地方阻隔着。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地名,不是族名。

唐代的“乌蛮”“白蛮”有着族属上的渊源关系。马曜先生在《云南各族古代史略》里说“而见于汉晋记载的滇僰、叟、爨,不过是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居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而已”。有史以来,叟与僰(白蛮)就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的,他们是一个民族的两个支系。

“叟”就是“乌蛮”,“僰”就“昆明人”,“昆明人”即是白蛮。

在先秦时期,“僰人”分布的区域很广。从凉山彝族自治州以北岷江流域与羌族杂居的芦山县、雅安,向南跨过金沙江至贵州北盘江、云南建水、石屏峨山;西至今天的楚雄州永仁、大姚、姚安一带,东至今天四川宜宾一带,这些区域内的“僰人”就是所谓的“昆明人”。秦朝的“僰侯国”就在今宜宾市,战国末年,秦国的商人便通过蜀郡(四川)而“南御滇僰,僰童”。说明滇池周围居住的僰人。僰道县西南今天云南东北部昭通地区的平坝中,住有不少僰人。按这个史据里的说法:“而僰人(白蛮)则主要分布在平坝地区,山区为其他被统治民族的分布区域,有僰人(白蛮)的分布区域往往超出滇国的统治区域范围以外。事实说明,在秦到东汉,昆明地区僰人(白蛮)居多,提到僰人(白蛮)就叫“昆明人”,昆明成了僰人(白蛮)的代称。所谓的“昆明族”就是白蛮。

如果我们不把“僰人”定位为“昆明人”,那么,居住在云、贵、川三省这片土地上的僰人哪里去了呢?我的回答是:有的专家把“僰

人”(白蛮)以地名为代称的昆明人,弄成了“昆明族”了。这是云南民族史上的一大误区,也正是这一误区,造成了云南民族史的族源混乱,所谓的“昆明人”就是白蛮为主的民族。像在三国之时,把云南人叫做“南蛮”,“南蛮”是云南人的代称(也是统称),南蛮并非是一个民族,它是一个多民族的群体。“昆明人”也不是单指“白蛮”,而是指以“白蛮”为主的居住在昆明地区的族群。

所谓“昆明人”居住的区域,就是僰人(白蛮)与叟人居住的区域,也因为僰人(白蛮)在昆明周围居住的人口较多,所以叫成了“昆明人”。难道我们今天所说的四川人,就是“四川族”,云南人就是“云南族”,贵州人就是“贵州族”,昆明人就是“昆明族”,大理人就是“大理族”吗?很明显的僰人(白蛮)就是白蛮,我们不能把白蛮误认为“昆明族”,更不是“乌蛮”。乌蛮与白蛮从汉朝到唐初没多大的改变。只是“僰”的集居地在滇国统治中心的滇池地带较多,所以用地名“昆明人”的“僰人”就是白蛮。纵观以上的历史记载,昆明一词从汉朝至今都是以地名出现,这应是毫无疑问的。

&gt; 书人书事

##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

张雪飞

从文连小学都没毕业就到北京谋生,想靠写作维持生存。有时候作品难以发表,他连吃饭都成问题。他会到报馆去看作品发表了没有,如果发表了,就顺便要稿费解决生计问题。当时一家报社副刊的主编看不上他的稿子,当着他的面将他的稿子用浆糊粘起来,指责说:你这东西还想发表,只能当废纸!并当场将他的稿子攒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去了。

面对退稿的无情打击,甚至是像沈从文这种正面遭遇羞辱,作家怎么办?正所谓“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。”在奋进者的人生信条里,是没有逃避畏缩之说的。那些最终在写作上大获成功的作家,是不会向困难低头的——稿件被退回后,就接着再投,再写呗。余华就曾经回忆说:“被一个杂志退稿了,我就换家杂志再投稿。因此,一件作品寄给过很多杂志,可以说我的稿子去过的的地方比我过去的地方都多。”

有的作家甚至更激进,直接把退稿单贴到墙上,以鞭策、激励自己。美国当代小说大师斯蒂芬·金写出第一个原创故事《欢乐礼券》就遭到了退稿,他并未气馁,将退稿条钉在墙上。后来他一直坚持这样做,当钉子难以承受退稿的重量时,他就换个大钉子,

继续钉,继续写。中国作家中像这样做的也不乏其人。贾平凹未成名前,也曾遭遇大量退稿。他创作相当勤奋,稿子向全国四面八方投寄,又源源不断地被退回来。他曾感慨:“退稿信真多,几乎一半是铅印退稿条,有的编辑同志工作太忙了,铅印条子上连我的名字也未填。”他将收到的这些退稿信都贴到墙上,“抬头低眉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耻辱。”

细细探究,作家遭遇退稿,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类。一是稿子质量有问题,还达不到发表、出版的水平。二是稿子好但不适合发表、出版。这看似似以理解,但确实存在这种现象。两次荣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家阎连科曾戏称:“我是中国作家家里被退稿最多的人。”小说《四书》创作出来后,他觉得小说的结构、语言、人物塑造都发挥了他最大才华,但先后投给二十多家出版社、杂志社,得到的反馈都是这是一部好小说,但确实不适合发表、出版。三是编辑的眼光有问题,没判断出作品的价值。四是作家尚没名气,不受编辑待见。这大概是作家遭遇退稿最直接的原因。因为我看过不少作家的自述,他们被退稿都发生在成名前,成名后就很少

至再也没收到过退稿。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丛书作者J·K·罗琳的经历就是例证。

2013年,已经功成名就的罗琳突发奇想,以笔名“罗伯特·加尔布雷斯”出版长篇小说《布谷鸟的呼唤》。因为是“新人”,小说的出版之路也充满曲折,曾遭到多家出版社退稿。退稿信指出“出版这本书不会有销路”,并建议作者“参加写作课程”,以获得对小说建设性的批评。好不容易出版后,在罗琳承认她是《布谷鸟的呼唤》的作者之前,这部小说的销量还不到500本。但她原作者的消息被曝光后,这本书顿时销量大增,一跃登上畅销书排行榜。

时下,随着社会的进步,作家一般很少收到退稿了,因为现在时兴网络投稿,作家只要把写好的稿件投进报刊公布的邮箱即可。投稿虽然变得便捷了,但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——这样投出去的稿件,如果不采用,编辑一般是不会回复的,因而很多作者都感叹,投出去的稿件经常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。当然,现在在网络上发表作品比较容易,但网络动辄要求作家每天至少更新几千字,这对作家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压力建设。故而不少网

络作家在网上成名后,还是会转到传统的写作领域来,谋求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或将作品出版成纸质书。

作家蒋子龙曾写过一篇《编辑何以为“大”》的文章,文中说编辑要能慧眼识珠。我深以为然。文学是一条艰难、漫长的羊肠小道,编辑选稿时不应只盯着名家或熟人,对那些在文学小道上艰苦跋涉,犹如在暗夜中苦苦摸索的无名作者来说,尤其需要给予一点点灯塔般的光亮,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。有时也许就是编辑投出的星星之火,就能改变一位作者的命运。

一天阅读时看到“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”这句话,我顿有醍醐灌顶之感。冰心老人说过:“成功的花,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!然而当初她的芽儿,浸透奋斗的泪泉,洒遍了牺牲的血雨。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,成功无不源于锲而不舍的奋斗和坚持。对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,收到退稿,抑或投稿石沉大海,都不必太在意,重要的是坚如磐石地读和写。退一步说,一个作家即使最终也没能靠写作扬名立万,但起码也享受到了创作中那种独特的愉悦,这难道不是一种收获吗?

&gt; 读书漫笔

## 美食家梁实秋

李成生

梁实秋写吃的文字,令人垂涎欲滴中领悟生活的智慧,甚至感悟人生的意義,他是把吃到化境的散文大师。他说:“人吃,是为了活着;人活着,不是为了吃了。”(《雅舍谈吃》,作家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,下同)我坚信梁先生是一个地道的美食家,他那些“吃的经验”如若不是亲身体味,是写不出来的,而且,他不但善吃,还能烹饪美食。

梁先生是个“吃贯中西”的人,他吃过中国传统名菜火腿、醋溜鱼、锅烧鸡、狮子头,还吃过美国的热狗,喝过康乃馨牛奶;他在北平(今北京)的小巷里喝豆汁吃油条,在美国排队吃自助餐,他应该是一位最理解吃也最会吃的先生。

梁先生吃过的一些菜,令人耳闻所未闻,如《糟蒸鸭肝》,“所谓糟蒸鸭肝,精选上好鸭肝,大小合度,剔洗干净,以酒糟蒸熟。妙在汤不浑浊而味浓,而且色泽鲜美。”《爆双脆》:“所谓双脆,是鸭胗和猪肚儿”,特点是“吃在嘴里韧中带脆”。一册《雅舍谈吃》里,直接以菜名入题即达63篇,不但介绍菜的用料和烹饪方法,还纠正一些误解:“西施舌属于贝类,似蛤而小,似蛤而长,并不是蚌”。缘起郁达夫的《闽小记》说,西施舌“指蚌而言”,先生对吃的钻研已入微细之处,恐怕一些烹饪大师也难望其项背。

梁先生对做菜研究很深。他说:“醋溜鱼当然是汁里加醋,但不宜加多,可以加少许酱油,也不能多加。”狮子头的秘诀是“多切少斩”;瓦块鱼的真相是:“一块块炸黄了的鱼,微微弯曲呈瓦片形,故以为名。”“锅烧鸡用小嫩鸡,北平俗称‘桶子鸡’,疑为‘童子鸡’之讹。”芙蓉鸡片的烹调秘方是:“取鸡脯肉,细切细斩,使成泥。然后以蛋白搅和之,搅到融和成为一体,略无渣滓,入温油锅中摊成一片片状。片要大而薄,薄而不碎,熟而不焦。”梁先生有多种方法吃鮑鱼:红烧、涼拌、燴羹,只求“异香满室”。

先生写吃,亦然形成一部“梁氏菜谱”,据说不少主妇就是看着他的小品文做饭的。但梁先生其实不仅仅是写吃,他骨子里透出的是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,即使是非常短小的篇幅,都透出一股浓浓的“文化味”。他不承认自己对饮食文化有研究,只是认为“只因我连续吃了八十多年,没间断。”可是连续吃了八十多年的人比比皆是,写出如此奇妙文字者凤毛麟角。关于吃的文化,先生引出《朱子语类》:“问:‘饮食之间,孰为天理,孰为人欲?’曰:‘饮食者,天理也;要求美味,人欲也。学者须是革尽人欲,复尽天理,方始是学。’”他其实怀着一颗平常心写吃:“我以为要求美味固是人欲,然而何曾有背于天理?如果天理不包括美味的要求在内,上天生人,在舌头上为什么要生那么多的味蕾?”他写吃的目的:“偶因怀乡,谈美味以寄兴;聊为快意,过屠门而大嚼。”

吃“两做鱼”他想到的是《诗经·陈风》:“岂其食鱼,必河之鲤?”“岂其食鱼,必河之鲤?”他考证《本草纲目》:“鲂鱼处处有之。”以为鲂和鲤是中国很普遍的食材,是古人的家常菜,而鲤鱼以黄河所产最佳。“炮青蛤”缘起《梦溪笔谈》;“生炒鳝丝”源头在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中,更被《顾氏家训·归心》所载;“水晶虾饼”之材料最早可考《尔雅翼》;“煎馄饨”宋人程大昌在《演繁露》里就说得很清楚;吃莲子他想到《古乐府·子夜歌》:“乘月采芙蓉,夜夜得莲子。”吃饱鱼先生想到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:“会暑,上辒车臭,乃诏从官,令车载一石鲍鱼,以乱其臭。”说到笋,先生更是引经据典,说尽了食笋的好处。中国人好食笋,《诗经·大雅·韩奕》说:“其簌维何,维笋维蒲。”《唐书百官志》也说:“司竹监掌植竹苇,岁以笋供尚食。”古代有专门管理种笋的官员。笋在历史上是不可多得的美味,苏东坡初到黄州即写诗称道竹笋“好竹连山觉笋香”,提倡“餐餐笋煮肉”。在《笋》这篇散文中,梁先生还提到杜甫的《发秦州》,其“密竹复冬笋”句,引出“冬笋不生在地面,冬笋是藏在土里”的话题,指出冬笋这种食材的稀少难得。

先生对吃是有深悟的。他说:“然而讲究起来,这其中也有艺术,又有科学,要天才,还要经验,尽毕生之力恐怕未必能穷其奥妙。”中国人最讲究吃,“是世界第一”,吃得精确实不算本事,酸甜苦辣五味调和才算真正的“食客”。中国人的吃相在古代其实很